



陽朔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朔县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阳朔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86141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朔县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回忆临阳联队抗日武装斗争·····	陈寅星 (1)
遇龙村抗战胜利碑·····	陈毓芬供稿 (17)
天作寨抗战记·····	陈毓芬供稿 (18)
怀念父亲陈宝书·····	陈毓芬 (19)
陈宝书在阳朔留下的墨绩·····	天 光 (23)
回忆陈宝书先生·····	何维馨 (26)
帅础坚先生在阳朔·····	天 光 (29)
莫鲁其人·····	李福基 (35)
阳朔县壮族简介·····	邓礼经 (40)
壮族历史人物	
兵部员外郎——覃兆勋·····	曾纪仍 (42)
酷吏蒙方侯镇压壮族人民·····	何大德 (45)
回忆在阳朔中学的日子·····	陈贞嫔 (47)
抗战时期阳朔的戏剧演出活动·····	陈秀珍、李华兴 (52)
话剧在阳朔·····	李华兴 (54)
莫超人在阳朔轶事·····	李华兴 (55)
关于兴坪战时服务队的几点补充·····	徐 净 (56)

回忆临阳联队抗日武装斗争

陈寅星

从兴坪战时服务队到临阳联队

一九四四年冬阳朔沦陷，国民党的黄绍立、罗志强率领的“抗日挺进军”和罗文修自卫队离开阳朔兴坪后，兴坪再次成为敌后空白地带，兴坪战时服务队便抓紧时机，建立自己的抗日游击队。服务队员都背上了枪，还到各村动员青年农民和从桂林逃难来的人参加游击队。初建的游击队只有30余人，分散驻在兴坪东面靠近瑶山的村子里。这里的地形有利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进可以出击盘踞漓江沿岸的日军据点和日军交通线，退可藏进瑶山。

我们的武装队伍逐步扩大了，但还没有正式的队名和编制，当时主要忙于军事、政治训练和搞后勤供给，解决生活问题。但游击队的架势一摆开，就感到干部不够用，许多工作缺人去干，肖雷同志和我们说，他可以设法去外地动员一批青年前来阳朔打游击，其实他是去中共广西省工委汇报阳朔的工作，因那时他与我还没有组织关系，不便直讲。我和孙忆冬仍按庄炎林的指示积极创建抗日游击队。当时，我们搞游击队基本上是依靠外来的十余名青年和本地的一批青年学生。孙忆冬认为必须加强民运工作，打好群众基础和建立一支武器精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基干战斗队伍，才能

打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但是，我们感到力量不足，不能有力地开展工作。

建立临阳联队

肖雷于一九四五年一月离开兴坪，春节后他和黄友平（黄嘉）同返兴坪，黄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工委桂东区的特派员。我与黄曾在一九三八年桂林中学同学，那时，在黄的动员下，我们一起参加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同在第一团第二中队工作过。黄友平到兴坪战时服务队后，在他接组织关系时告诉我，省工委派他来阳朔领导桂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阳朔兴坪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今后还会有一批同志前来加强工作。从此我和孙忆冬就在黄友平、肖雷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黄友平到来后立即抓紧建立抗日临阳联队的工作。我们的游击队取名“临阳联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只不过表明它是在临桂和阳朔地区活动的游击队。我记得在研究建立临阳联队时，还考虑了打什么旗号的问题。因为部队成立后就需要向地方上的富户征粮，供应军需。必须考虑用什么名义征粮比较容易。最后决定暂时借用桂林地区民团指挥部的名义。我们为此刻了一个带有民团指挥部头衔的临阳联队关防（四方大印），这个关防并非黄绍立发给的，而是我们自制的。

黄友平到兴坪时，我们（兴坪战时服务队）已有长短枪共四、五十支，但报名参加游击队的青年学生和农民尚未完全集中起来。我们就在大源乡香粉厂进去的瑶山里，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即太太庙，那里住家稀少，有一个破庙，还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段），作为集中地，在那里宣布

临阳联队成立。联队建制：设司令部和政治部，下有两个中队。联队长是黎禹章，副联队长是赵桂器，政委是黄友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肖雷，参谋长是谢刃天。黎禹章兼一中队队长（一中队主要由服务队队员和阳朔本地农民组成，服务队曾经用过“四中队”名称，所以人们仍习惯地称一中队为“四中队”），孙忆冬是政治指导员，姚大年也在一中队，谢刃天兼二中队队长，我是政治指导员。一中队是联队的主力，人数约五、六十人，全部战士都配备了武器，经常与联队部一起行动。二中队由收容的散兵游勇难民和本地一些农民组成，人数仅廿人左右，多数战士没有武器。政治部主要由服务队的女同志和青少年组成。黎、谢两人是军校出身，又有实践经验，所以推他们担任军事指挥员。赵桂器是本地人，在群众中有威信，他任副联队长，有利于对外进行联络和统战工作，扩大联队的社会影响。

联队成立后，进一步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加强政治教育。军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均由孙忆冬按新四军的做法制定。政治部下面设立民运队，任务是做驻地山区居民和邻近农村的民运工作，并且派人刺探日军敌情，同时也了解国民党黄、罗留在兴坪地区余部的动态。

联队领导核心由黄友平、肖雷、孙忆冬、赵桂器、黎禹章和我组成，经常碰头研究各项工作。我们多次讨论研究打击日军和敌伪维持会的行动计划，但鉴于联队立足未稳，南面有黄、罗部队的滑石瑶留守处，北面有敌视我们的“挺进大队”（是黄立绍收编的地方反动武装，他的大队长是当地恶霸秦伟民），为肃清心腹之患，巩固联队的后方，便决定先把这两个钉子拔掉。

黄、罗的滑石瑶留守处，驻守兵力很少，临阳联队派了一个分队就把留守处接管下来，缴获几支枪和冰糖等物资。这时，在滑石瑶的临阳联队与陆支礼率领的平(乐)北游击队廿人左右会师，平北游击队编为联队的一个中队。以后二中队与陆支礼的中队合并组成第一中队，中队长陆支礼，政治指导员是我。

一九四五年四月，韦立仁等十余人先后由省工委派到联队来工作，韦立仁担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民运队工作。李林林、覃美英、覃舜恩、关照、肖含芳等地下党员来充实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庄炎林此时已到达临阳联队驻地，黄、肖、庄、韦等领导核心与联队的主要骨干开了几天会，由庄炎林同志传达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主要是有关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一起分析研究当前的形势，讨论联队的活动方针。

临阳联队成立时，我们听说在大圩、草坪、亨庆一带有一支武装力量在活动，它既打日本鬼子，又骚扰抢劫老百姓，老百姓称它是“土匪”。据了解这个武装部队的成员是从桂林疏散出来的广东难民，他们收缴了国民党溃军的武器结成一伙。这股武装力量的头头是唐致祥和陈运民，共有四、五十人，武器精良，拥有轻机枪、冲锋枪和长短枪数十支。他们既抗日又扰民，当时联队领导认为有争取和改造的可能，因而派邓渭洪和李丹去接触了解其内情。当时，我们考虑如能把它争取和改造好，将大大增强联队的实力和威信，有利于开展临桂和阳朔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邓渭洪、黄友平、黎禹章先后与唐致祥、陈运民进行几次谈判，最后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临阳联队的领导，编为第五中队，还同意

联队派人进五中队担任副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接受联队政工人员到五中队对战士进行文化、政治教育，但又坚持其原来编制，独立活动。我们为了深入其内部做下层工作，就接受了他的这些条件，派邓渭洪和李丹进五中队担任副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派洪智民、诸葛鑫、秦智园、白芝灵等人进五中队工作。由于我们的工作需要，五中队曾配合联队打过几仗。但是这个武装部队的头头唐致祥及其一伙小兄弟的素质很差，流氓成性，一心想发国难财，不愿接受临阳联队的严格军纪，最后还是脱离了联队。我们积极耐心地对这股武装力量做争取工作，但收效不大，只争取到陈运民等少数几人参加临阳联队。

首 战 蓬 山

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临阳联队在临桂县亨庆乡蓬山村进行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击溃秦伟民的“挺进大队”，俘虏秦部士兵三十余人，缴枪四十余支（包括轻机枪二挺，冲锋枪一支，重机枪一挺）。临阳联队首战蓬山，事先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布署，动用全部兵力（共四个中队），以五中队、四中队为主力，在清明节拂晓冒雨潜入蓬山发动袭击，秦伟民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只经过几十分钟战斗，就停止抵抗，束手就擒。但大队长秦伟民在枪响后，从村子的后门逃跑了，联队组织武装小组搜捕秦伟民，最后由当地人民告发，邓渭洪带领武装小组在龙岩巖捉住了他。当夜黄友平与黎禹章审讯秦伟民，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结果把他拖到野外枪决了。秦平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联队处决恶霸秦伟民，为民除害，大快人心，当地居民纷纷给联队送粮送

菜，以表感激之情。

五中队在攻打秦伟民大队的战斗中，冲锋在前，打得很猛。他们在战争中，抢先去缴获秦伟民大队的轻机枪和冲锋枪，我们也缴获了一挺破旧的重机枪和30余支长枪（都是比较新式的枪支）。在蓬山之战后，联队再次扩军，便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百多条长短枪，二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

联队解决了秦伟民大队，使反动的民团和地主武装增加了对联队的敌视和仇恨。联队是在地方反动武装的迫害和压制下建立的，指战员的反顽情绪很强烈。为了摆正抗日与反顽的关系，正确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蓬山之战后，联队党的领导召开了两天干部会议，讨论抗日与反顽的关系问题。这次讨论对联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联队的成长过程很容易使指战员得出“不反顽便不能抗日”的结论，通过讨论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水平，大家都认识到临阳联队应以抗日为主，在抗日战斗中团结各阶层群众，发展壮大自己。对反动的民团应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进行斗争时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接着，联队就发动了第一次主动出击日军的战斗。

伏击日军船只的战斗

我们认为：选择伏击航行于漓江的日军船只来打击日军有两点好处：第一，日船经常航行桂林阳朔之间，容易捕捉战机。第二，我们在漓江两岸居高临下，打击日军船处于主动地位，敌人则被动地挨打。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联队司令部得到情报：日本军船若干艘由大圩开往阳朔。为了伏击日本军船，黎禹章、孙忆冬等早已在兴坪下游的漓江沿岸

察看地形，选中了兴坪附近的一处阵地。第二天清晨，黎禹章联队长便带领二、四中队渡江到达西岸，在阵地附近的山林里休息待命。另一部分队伍到达阵地对岸的江边，黎禹章、孙忆冬、姚大年、谢刃天和我聚在一起，分析敌情和布置战斗任务。为了防备日军的陆上护送队，黎禹章命令在离阵地几里外派出监视哨。我们的部队等了一个上午都得不到日军船只的确切消息，只知道日军船从大墟开下来了。下午二时左右，我们预计日本船只如果已从大墟开出，天黑以前必将抵达兴坪，否则当天就赶不到阳朔县城。黎禹章下令部队进入战斗阵地，严阵以待。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在阵地上远远看到有日本船只从兴坪方向开来，但出乎我们的意料，只有一条船。临战前战士们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日本船进入伏击圈内，黎禹章一声枪响，七、八十支枪就呼呼轰轰地瞄准日船，开始射击。船上的日军龟缩在舱内，不敢回击。只见日船周围水面纷纷溅起水花，看来我们的战士枪法不准，击中日船的子弹不太多。但在密集射击下，日船也够受的了。不一会，日船开始在水面上打转，不能继续前进了。这时，岸边忽然响起了轰轰的枪声和“轰轰轰”的榴弹爆炸声，显然日军陆上护送队已赶到，开始向我阵地轰击。顿时我们的队伍怔住了，黎禹章、孙忆冬、姚大年等立即指挥队伍朝日军枪响的方向奔去，一边射击，一边占领有利地形。岸上日军的突然袭击，使缺乏作战经验的战士感到不知所措，有些人没有跟着指挥员，却朝路边的山上跑了。我们朝日军射击，日军也朝我们射击，但是双方距离较远，当中又有繁茂的树林挡着视线，谁也看不到谁。日军怕我埋伏，不敢贸然前进。双方对射了一阵，联队

的指挥员及战士才分批往山上的树林里撤退。伏击战变成了一场混战。我跑到山上碰到一些战士，把他们集中起来，叫他们保持镇静，以免暴露目标。当夜，就在村附近的山上过夜。夜阑人静，我们听见日军进入×××村，哇喇哇喇地讲着日本话，下半夜日军悄悄地溜走了。

次日早晨，联队在蕉芭林村重新集中队伍，清点人数，无一人伤亡。联队长作战斗总结，进行教育。事后指战员回想起战斗中敌人和我们自己的狼狈相，都感到很可笑。但是，通过这次伏击战，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联队的抗日名声远扬。附近老百姓说：国民党桂林地区民团指挥部的黄、罗部队，武器精良，人员众多，不敢碰日本侵略军的一根毫毛。而武器寡劣、人员很少的临阳联队却敢于打击日本侵略军。这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一九八二年我陪同一个法国旅游团乘船游览漓江，船过兴坪时我找驾驶船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船老大闲谈，问他抗日时期这里是否与日本鬼子打过仗，他说：“那时我只有十来岁，亲耳听到临阳联队与日本鬼子在廖崖背、瀑布塘一带打仗的枪声。临阳联队敢打日本鬼子，真了不起！”

在这次袭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也暴露了联队战士的弱点：缺乏军事训练，组织性、纪律性不强，临阵不听指挥，极需加强训练。

公开党的旗帜，发表“时局宣言”

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联队从瀑布塘回到大源乡，主要领导骨干开始讨论公开共产党的旗帜问题。讨论时多数意见赞同公开党的旗帜。因为：第一，临阳联队一直打着桂林地区民

团指挥部的番号去征粮筹款，现在临阳联队的实力已经强大，不需要再利用这个番号了。应该把它撤掉。第一，临阳联队打出党的旗帜，使进步人士更靠近我们同情我们的人更多了，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第三，我们不打共产党的旗帜，他们早已把我们看作共产党。对反动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不要过多考虑。但也有人提出：应该考虑公开党的旗帜后是否会增加社会各阶层群众对临阳联队的疑惧，反而不利于我们开展工作。最后还是决定公开党的旗帜。临阳联队的全称即改为“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

五月廿八日，临阳联队以中国共产党桂东北特委的名义，发表了“为公开揭举我党旗帜对时局宣言。”受到临阳联队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进步和同情我们的社会各界人士也感到欢欣鼓舞，而使敌视我们的反动分子更是感到恐惧。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临阳联队。

一九四五年六月，省工委书记钱兴派庄炎林前来传达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临阳联队化整为零的指示。

临阳联队南下平乐、荔浦

一九四五年六月初，临阳联队受到桂林地区民团指挥部黄绍立、罗志强部队的严重威胁。黄、罗在八步吃了败仗，卷土重来阳朔纠集地方自卫队，扬言，“要消灭临阳联队。”五中队闻讯发生动摇，宣布脱离临阳联队，另打“抗日义勇队”的旗号。这时，联队主要领导骨干讨论应采取什么对策：是留在原地坚持抗日游击活动，黄、罗部队攻击我们则予以反击？还是北上灵川或南下平乐、荔浦与当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会合，扩大我们的队伍，开创桂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多数骨干认为临阳联队的实力不够强大，游击地区不广，缺乏回旋余地，跟黄、罗部队进行正面较量，对我不利。而与南北两地党的武装队伍会合起来，组成强大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有可能打开桂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一九四五年六月中旬，我们就抱着这个希望，满怀信心地南下平乐、荔浦地区。

联队南下前，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从各中队抽调身强力壮，勇敢善战的小伙子20余人组成突击队，队长邓渭洪，副队长陆支礼，配备最好的武器，由联队部直接指挥。他们的任务是为联队行军打头阵，完成各项紧急的战斗任务。把陆支礼的六中队与一中队合并，充实一中队的战斗力。把政工队员调入中队当政治战士，加强部队在行军，作战时的政治工作。

在南下途中，我们一路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日军，以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威力。部队在平乐县城附近的河口及荔浦县的马岭两次袭击了日军，使临阳联队抗日的声誉大振。

南下前，我们对平乐、荔浦两地党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不甚了解，以为那里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已经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进入荔浦后，才知道当地的党组织尚未掌握武装力量，不可能支援临阳联队扩大队伍，打开武装斗争的新局面。由于没有稳定的后方，我们的队伍只得在马岭和思贡一带流动，荔浦、平乐、恭城三县的反动自卫队则到处跟踪拦阻和封锁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部队得不到休整，粮食供应困难，地方反动武装又策划调集数倍于我的兵力，对我

发动围攻。一九四五年七月初，联队领导决定：重返阳朔老区。

在返回途中，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克服重重困难，通过道道封锁线从平乐龙窝进入阳朔找到联队。他是来联队传达省工委的紧急指示，当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指出：希特勒投降，日本陷于孤立，为缩短战线，日本侵略军已开始从广西撤退，国民党反动派正调集大批正规军企图在日军撤退后，会同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围剿，消灭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桂东北地区，已经公开党的旗帜的临阳联队，是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主要目标。临阳联队实力不强，没有建立真正的根据地，倘若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批正规军的围剿下，定要遭受很大损失。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必须从武装斗争转入地下斗争。因此，为保存革命实力，临阳联队要化整为零，撤退干部，疏散战士，隐藏武器，待今后时机到来再集中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讨论和执行省工委指示

庄炎林找到联队，就随联队行军，先向联队的主要骨干传达省工委紧急指示。在讨论时，有些同志不相信形势会这样急转直下，要求临阳联队再坚持斗争下去。如果在临阳地区站不住脚，就朝广东转移与东江纵队会合，或由湖南北上与八路军、新四军汇合（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路军的“南下支队”由王震率领从延安出发南征。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南下支队”已打到广东边境，准备进入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师，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这一重大战略

部署未能实现。王震的“南下支队”又北返延安）。这种看法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且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发展。

联队主要骨干统一了认识，就着手制订行动计划。当时，决定临阳联队化整为零的撤退计划，对内逐步下达，对外绝对保密。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对地方反动武装采取以攻为守策略，予以必要打击。撤退工作的步骤：第一步，先分批悄悄地把政治部的女同志和青少年撤走。第二步，确定本地隐藏工作的领导人，负责制定在本地农村分散隐蔽的干部和战士名单，选择埋藏武器的地点，并进行具体安排。当时赵桂器自告奋勇要求留下来担负这项工作，大家认为赵担负这项工作是最合式的，但风险大，建议另行考虑他人。但赵桂器坚持说，他地形熟、关系多，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这个任务，他人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最后大家同意把这个任务交给赵桂器负责。第三步，干部分两批撤走，一批是外省干部，由庄炎林率领武装撤退，一批是本省干部，由黄友平率领化装撤退。第四步，不能在本地隐藏的干部战士和外地的战士编成分队，由肖雷和邓渭洪带领到灵川投奔阳雄飞、吴腾芳的部队。

撤离前的几次战斗

临阳联队南下平乐、荔浦后，桂林地区的黄、罗部队及地方反动自卫队进驻我们的老游击区，劫夺我们留存的物资，逮捕和残杀我们的地方干部。七月十一日联队从荔浦返回阳朔木桥村，得知阳朔县自卫队已经联合平乐的自卫队，企图在留公一带围歼临阳联队。我们部队改变行军路线，在蚂蝗渡口过江，依山道行军于傍晚时刻到达古座塘村。这

时，我们部队经过几天的日夜行军，指战员们都感到非常疲劳，联队部决定将部队分驻崩山岭、黎村岭和古座塘休息。次日清晨，已经占领古座塘村周围山头的国民党阳朔县东区自卫联队的几个大队突然向我们的驻地开枪射击，但他们不敢直冲下山来袭击我们。陆支礼、谢刃天与我指挥一中队驻在崩山岭村里，立即布置战士占据村外有利地形，准备应战。不久联队部通知召开紧急会议，谢刃天去参加了。老谢回来传达分给一中队的战斗任务是冲上崩山岭占领山头阵地。吃饭后，联队的重机关枪发射了，这是战斗开始的信号，我和老谢便率领战士往崩山岭山头冲。山上的树林繁茂，我们看不见自卫队有多少，只是偶尔见到树叶缝里有人头闪烁，待我们奔上山头，只看到自卫队逃跑的背影。我们沿着山上的路追赶一阵，便停下等待联队部的命令。后来听说肖雷和孙忆冬带领战士仰攻燕子岭的战斗最激烈，他们打死了一个敌人，还搞了国民党东区自卫队第五大队长黎金吾的老窝，缴获一批物资，俘虏了几个人。古座塘之战对联队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背水一战，战士们在战斗中，服从指挥，英勇作战，以少胜多，狠狠打击了反动自卫队的嚣张气焰。古座塘战斗胜利结束后，联队渡江转移到蕉芭林、赖吉一带进行休整。

在休整期间，领导向联队传达了上级关于临阳联队化整为零的决定，并开始进行撤退工作。

联队在撤退前夕，于七月下旬对盘据在大源乡江村的反动自卫队头目秦森进行了一次惩罚性战斗。为了孤立秦森自卫队，联队派邓渭洪去“抗日义勇队”（原五中队）游说，希望他们参加对江村秦森自卫队的讨伐行动，他们接受了我

们的建议。七月二十二日，联队渡河到达东岸，神速地接近江村，与五中队一起攻进江村，秦森自卫队退据村外顽抗。联队长黎禹章下令由五中队以机枪火力掩护，向秦森自卫队发动冲锋。秦部立即朝附近的山寨溃退，我们的部队跟踪追击。就在此时，原五中队人员忽然成群结队地涌入村里民家去抢劫钱财衣物。他们的土匪行径使我们非常被动，以后地方反动派就借此诬蔑临阳联队是“土匪”。

江村之战的当夜，联队到漓江东岸的大龙巖村驻扎。在那里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事件：一位同志在擦枪时与赵桂器开玩笑，误伤了赵桂器，子弹击中赵的左胸部，伤势非常严重，当时无医药，只得采用土法（将南瓜瓤敷在伤口上）治疗，次日清晨，赵桂器逝世。这个不幸事件说明临阳联队的干部缺乏军事知识和严格的军纪。赵桂器的不幸逝世，对联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影响了联队的撤退工作。在为赵桂器举行的追悼会上，中共广西省工委桂东北特派员、临阳联队政委黄友平根据赵桂器生前的表现和要求，宣布追认赵桂器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临阳联队指战员按照化整为零的行动计划，分批撤离临阳地区。我跟随庄炎林率领的外省干部这一批撤离，准备武装突围。我携带一支左轮（只有五发子弹）和一颗手榴弹。我们一行十人：庄炎林、孙忆冬、黎禹章、陈寅星、姚大年、肖含芳、许英淮、何荣生、龙龙，还有两个是家住瑶山的本地战士，他们熟悉山路，负责引导我们从大龙巖出发，进入瑶山，一路都很顺利。出了龙尾瑶，我们走进路边民房休息，只见灶锅里有稀饭，但不见一个人影，见此异状，我们赶快走。出来大概几里路远，在一